



子尹路上的历史回响

遵义老城，子尹路96号，一栋灰白相间、中西合璧的二层砖木小楼静静矗立，在老城建筑中显得格外别致。

1935年1月，在这座小楼里召开的遵义会议，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、挽救了红军、挽救了中国革命，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。

91年后的今天，会址依旧，故事常新。仲秋时节，“记者再走长征路”主题采访队伍来到这里。小楼旁，一棵老槐树吸引了大家的目光。

这棵槐树高度超过10米，两根树干分别斜伸向空中，形如“V”字，很多来此参观的游客都会树下驻足，手比“V”字拍照留念。

“这是纪念馆唯一‘活着的文物’，因形如‘V’字，被大家亲切地称为‘胜利树’。”遵义会议纪念馆讲解员刘澄澄介绍，当年遵义会议召开时，这棵槐树只有碗口粗细。

后来，这棵槐树在历经风雨后长出新的枝干。老树让出生存空间，用残躯滋养新苗，形成了如今的“V”字形。这不仅是胜利的象征，更是生命的接力。

在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原副会长陆昌友看来，这棵树见证着伟大历史、昭示着不朽精神。每当微风拂过，树叶沙沙作响，仿佛是历史在与当下对话——遵义会议精神历久弥新、生生不息。

树以年轮铭记，人以讲述传承。“大家看这张照片，他参加过长征，当年在娄山关战斗上，腿部被6颗子弹击中。”大家围拢过来，注视着照



9月25日，游客在遵义会议会址参观。

新华社发

片里面清瘦的老人，遵义红色义务宣讲员孔霞顿了一下，“他就是我的爷爷，孔宪权。”

孔宪权是老红军，也是遵义会议纪念馆的首任馆长。筹建纪念馆时，他拖着伤腿和同事们翻山越岭，征集回1200多件珍贵文物。

受祖父影响，从1993年起，孔霞开始义务讲述红色故事。“我一直问自己一个问题：参观者走出会址后，能带走什么？”从事红色义务宣讲工作30余年来，孔霞在一次次寻访、一遍遍查阅、一场场宣讲中找到答案。

“带走的是一份信心和底气。”孔霞眼神一亮，“革命先烈在最绝望的时候都没有放弃，在遵义会议上作出抉择，硬是闯出一条生路。今天的人面对困难时想想他们，便没有迈不过去的坎。”

讲好长征故事，不只是讲述一段历史，而是点燃一颗心、照亮一群人。孔霞和同事们的讲述，打动了无数游客，也在青少年心中种下红色的种子。

“各位叔叔阿姨大家好，请大家看我身后这张地图。”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图前，“小小红色宣讲员”、遵义市朝阳

小学五年级学生李苏颐的声音，稚嫩而清晰。当被问到为什么参加志愿宣讲时，小姑娘想了想说：“想了解红军的伟大，想讲给更多人听。”

在遵义，“小小红色宣讲员”已成为当地颇具影响力的红色文化志愿服务品牌。2017年，遵义市正式启动这项工作，选拔培育中小学生学习义务宣讲，经过近十年的发展，红色故事在童声中传得更远。

少年们接过话筒的同时，纪念馆也在用新的方式让历史愈发可感可触。

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的VR体验区，当观众戴上设备，灯火通明的遵义会议会场、炮火连天的娄山关战场等场景次第铺展。沉浸式体验，让游客从“倾听者”变成“亲历者”，切身感受红军的艰难远征。

如今，通过数字化转型，纪念馆的展陈方式正实现从“静态被动”向“主动交互”转变。观众通过文物数字化、“触摸”文物、“对话”历史，互动感、体验感得到提升，长征精神愈发深入人心。

“走进遵义会议纪念馆，读懂的不仅是这段历史，更为重要的是，能够从中汲取坚定信念、坚持真理、独立自主、团结统一的信仰与力量。”遵义会议纪念馆研究部主任张小灵说。

走出纪念馆，游人在“遵义会议会址”牌匾前停下脚步回望。无声的洗礼中，前行的力量悄然生长。

门外，子尹路车水马龙、热闹非凡。繁华深处，历史回响，精神永恒。（据新华社）

约20厘米，高约10厘米，锅身有四处补丁，几经修补，被一路带到青藏高原的玛可河畔。

当年红军在班玛活动20余天，在子木达沟岩壁留下“北上响应全国抗日反蒋斗争！”的标语，这条全国后来被群众亲切命名为红军沟。2012年，红军沟被命名为青海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，纪念馆2017年正式开馆，年均接待参观者数万人次。

铜锅无言，岁月有声。从藏家灶台到红色展厅，这件饱经沧桑的文物，是红军与藏族群众鱼水情深的实物见证。玛可河畔红色薪火代代相传，长征精神在高原大地永续流淌。

（据新华社）

“特殊”的劳动纪律

当年，在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中，八路军359旅规定了一条特殊的劳动纪律——“生产时不得早到和迟退。”平日里，我们见惯了“不得迟到和早退”的规定，而这条规定为什么反过来了呢？这得结合当时的背景来说。

1941年春，为了打破日军“扫荡”与国民党经济封锁造成的物资匮乏困境，359旅在旅长王震带领下进驻南泥湾，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。当时官兵的劳动热情极高，天不亮就上山开荒，天黑了仍不肯收工。由于劳动强度过大，不少同志体力透支甚至生病受伤。为了保护官兵身体健康，让大家有长期坚持的体力和生产热情，旅部不得不作出“禁止早到、不准迟退，强制保证休息”的规定。

这条特殊的劳动纪律，既体现了旅领导对官兵身体健康的保护，又彰显了我军艰苦奋斗、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，蕴含着我军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精神密码。

特殊纪律的背后是领导的率先垂范。在大生产运动中，359旅提出“全体参加生产，不让一个人站在生产战线之外”的口号，不论是旅团领导还是普通士兵，全部编入生产小组。王震身先士卒，同战士们一起开荒，即使双手打满水泡，鲜血染红镰把，仍坚持劳动。一名到边区采访的外国记者感叹：“王旅长的双手像他的部下一样，由于劳动而生满了老茧。”718团团长陈宗尧把团部设在山上，白天与战士们一起劳动，晚上处理公务；独臂政委左齐不能持械，就烧火做饭，挑送上山，让战士们吃饱饭有劲干活。

特殊纪律的背后是官兵的拼搏精神。“干部不怕苦，战士猛如虎。”在旅团领导的带动下，广大官兵更是你追我赶，不甘落后。718团模范班长李位，在开荒竞赛中创造了日开荒3.67亩的纪录，人称“气死牛”；719团战士刘顺清又以4.11亩的纪录，超过了李位，随后4支队战士尹光普又创造了4.28亩的新纪录……在劳动模范的带动下，359旅官兵劳动热情一浪高过一浪，他们打仗是英雄，生产是好汉，把人民军队不怕困难、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特殊纪律的背后是丰硕的劳动成果。一分耕耘，一分收获。从1941年至1944年，359旅累计开荒约30万亩，收获了大量粮食和蔬菜，有力打破了经济封锁，保障了延安军民生活之需，实现了“一把锄头一支枪，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”。更为重要的是，359旅在茫茫荒野上，高高地树立起大生产运动旗帜，铸就了“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”的南泥湾精神，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“花篮的花儿香，听我来唱一唱，唱一呀唱，来到了南泥湾，南泥湾好地方，好地方呀……”今天，当我们唱起这首《南泥湾》时，就会想起延安，想起359旅，想起南泥湾精神。那是党和人民军队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创造的伟大奇迹，是战胜一切困难的不竭动力。

（据《中国纪检监察报》）

古代刑罚“打板子”的由来



（资料图片）

古典小说与传统戏曲中，常见“重责四十大板”“板子伺候”等情节，大众俗称“打板子”，对应古代律法中的笞刑、杖刑。

这项流传千年的体罚刑罚，由先秦至汉初残酷的肉刑改良而来，其刑罚变革的关键契机，是西汉少女缇萦舍身救父的义举。缇萦的父亲淳于意是西汉名医，曾任齐国太仓令。他自幼潜心学医，先后拜名医公孙光、公乘阳庆为师，习得黄帝、扁鹊一脉的诊脉辨证、预判病情、用药治病的精妙医术。学成之后，淳于意行医精准灵验，救人无数，被百姓尊为“神医”。许多权贵希望将他召为专属医官，但他心系普通百姓，屡次婉拒，因此得罪不少官僚显贵。

后来，当地一名富商的妻子患病，请淳于意诊治，服药后病情未能好转，最终病逝。富商借机诬告淳于意误诊害人。官府听信其说辞，判处淳于意肉刑，并将他押往长安行刑。肉刑包含残肢、毁肤等残酷惩处，会让受刑者终身残疾、饱受屈辱，是极为野蛮的刑罚。淳于意的五个女儿见父亲蒙冤受酷刑，皆悲痛痛哭，唯有小女儿缇萦挺身而出，一路陪同父亲远赴长安。抵达长安后，缇萦冒死向汉文帝上书陈情。她坦言父亲为官清廉公正，如今获罪将受肉刑，而人死不能复生、残体不可复原，受刑之人即便想要改过自新，也再无途径。她自愿入宫为奴婢，以此赎免父亲的刑罚，给父亲改过向善的机会。汉文帝读罢上书，深深被缇萦的孝心与胆识打动，心生怜悯，当即赦免淳于意，同时反思肉刑的残酷弊端。他下诏指出，百姓犯错，尚未教化便遭残肢毁肤之刑，让罪人无从悔改，有违仁政爱民的本意，因此下令废除肉刑。

随后，丞相张苍、御史大夫冯敬奉旨修订律法，以笞刑也就是打板子，取代了严苛的上古肉刑，成为古代刑罚文明化的重要进步。但汉初的笞刑制度尚不完善，初期行刑数量多、刑具简陋，行刑致死、致残的情况十分普遍。《汉书》评价此次改革“外有轻刑之名，内实杀人”。为纠正弊端，汉景帝多次修订律律，大幅减少笞刑数量，统一规定竹制刑具的尺寸，并要求创平竹节，规范行刑标准，极大降低了刑罚的伤害性。

唐代律法体系成熟，正式确立死、流、徒、杖、笞五刑制度，笞杖之刑成为法定常规刑罚。唐太宗参考人体经络图谱，发现背部贴近五脏六腑，受刑极易致命，于是明确规定笞杖仅可击打臀部，严禁击打腰背要害，同时按罪行轻重细化刑罚等级，让量刑更加规范合理。此后宋元明清各朝基本沿袭这一制度，并不断微调完善。

清宣统二年（1910年），《大清新刑律》拟定颁布，正式废止沿用近两千年的笞杖刑罚，流传千年的“打板子”刑罚就此退出历史舞台。

（据《西安晚报》）

绫、罗、绸、缎 到底有啥不一样



战国龙凤虎纹绉罗单衣袖。（资料图片）

都说中国是丝绸之国，可很多人不知道，丝绸家族内部也是分门分派的。若有人问一句：绫和绸到底差在哪？罗和缎又凭什么并称？十个人里怕有九个答不上来。其实答案并不玄妙——它们都是蚕丝织的，区别全在织机上那一经一纬的“走法”不同。织法不同，织出来的布就生了不同的脾性。

先说“绫”。绫的特点是斜纹，东汉刘熙在《释名》里说得特别形象：“绫者，其文望之似冰凌之理也。”——看起来像冰裂纹，所以叫“绫”。

绫出现得很早，商代就有了雏形。绫的金贵，汉代就出了名。《西京杂记》记载，西汉权臣霍光的妻子送人二十五

匹“散花绫”，一匹值一万钱，价贵得惊人。到了唐代，绫迎来了高光时刻，越州进贡的缭绫名动天下。白居易在《缭绫》里写道：“缭绫缭绫何所似？不似罗绡与纨绮。应似天台山上月明前，四十五尺瀑布泉。”一匹缭绫织得像月光下的瀑布，织它的却是“越溪寒女”，穿它的却是“汉宫姬”，一诗写出多少辛酸。今人看唐代仕女画里衣纹流畅的裙衫，那多半就是绫的功劳。唐代官员的官服就是用不同等级的绫来做的，可见当时绫的地位有多高。

绫质地轻薄柔软，但结实。古代有“三尺白绫”，之所以选它，就是因为它韧性好、拉力强，普通丝绸一扯就断，根本

用不了。不过到了明清，绫渐渐退居二线，更多用于书画装裱和锦盒包装了。

再说“罗”。罗的织法在丝绸家族里算是个“异类”。普通的织物是经线平行、与纬线交织，罗却不一样，它用的是“绞经”——两根或更多的经线先互相绞缠，再和纬线交织。这样一来，织物表面就会形成稳定而细密的孔眼，透气性极好。古人说“薄罗衫子透肌肤”，说的就是罗穿在身上那种若隐若现、清凉透气的效果。

罗这个字听着就风雅，杜牧写“轻罗小扇扑流萤”，李清照写“轻解罗裳，独上兰舟”。它轻薄、半透、带镂空感，透气但不透肉，夏天穿它既凉快又不失体面。

罗在商代就已经出现，1982年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了一件“龙凤虎纹绉罗单衣”，衣面是灰白色的素罗，上面用红棕、黄绿、黑灰七种颜色的丝线绣出龙凤虎，绣工精美得叫人咋舌。这件衣裳如今是荆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，也是迄今所见先秦保存最完整的罗。宋代的罗工艺达到顶峰，有一种“四经绞罗”织造技术，后来失传了，至今仍是中國丝绸史上的一个谜。

接下来是“绸”。绸这个字，在古代写作“紬”，原本指的是抽茧绪加捻成线织出的平纹织物，质地紧密厚实。但“绸”有个特殊之处：它后来慢慢变成了丝织品的“通称”。今天我们说“丝绸”“绸缎”，其实都是把绸当作了所有丝织品的代名词。明清时期出现了很多以产地命名的绸，比如宁绸、潞绸，各地工艺不同，风格也大相径庭。

绸的特点可以用三字概括：平、密、

实。没有绫的斜纹，没有罗的孔眼，也没有缎的光滑，就是规规矩矩的平纹织物。

最后说“缎”。缎是这四种里最“年轻”的。目前还没有发现宋代以前的缎织物实物，它真正盛行是在明清时期。缎的织法叫“缎纹组织”，特点是经线或纬线中的一种以“浮长”的形式布满表面，把另一种组织点遮盖住，所以缎的表面特别光滑、特别亮，摸上去手感厚实而顺滑。正因为缎看起来贵气逼人，明清时期它成了高级丝织品的代名词，贵族服饰、织金锦缎都离不开它。我们今天常见的花软缎、织锦缎、古香缎，都属于缎类。

总结来说：绫有斜纹的肌理感，罗有绞经的透气孔，绸以平纹的紧密厚实取胜，缎则靠缎纹的浮长线获得光滑亮泽。它们各自代表了不同的织造技术路径，也各自对应着不同的穿着场景和审美趣味。

“绫罗绸缎”这个词作为一个固定搭配，其实出现得很晚。它最早见于清代文康的小说《儿女英雄传》，原文里说“金子是黄的，银子是白的，绫罗绸缎是红的绿的”，用来形容京城繁华，世人趋利。在那之前，古人是分开设说罗、绸、缎的，并没有把它们捆在一起当作一个词来用。

这四种织物背后，是中国丝绸技术几千年的演进。从商代的绫和罗，到明清的缎，每一种新织法的出现，都意味着织机的改进和工匠对丝线控制能力的提升。一根蚕丝只有几微米粗，古人却能用它织出斜纹、绞经、缎纹这样复杂多变的结构，这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。

（据《北京青年报》）